

迁移与紧急状态：巴生班达马兰新村的冷战景象与记忆*

Migration and State of Emergency: Cold War Scenes and Memories in Pandamaran New Village, Klang

林德顺**

(LING Tek Soon)

摘要

新村是冷战的产品。位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巴生港口附近的班达马兰新村也不例外。它在1951年设立后，英国殖民地政府从巴生周边强制迁移约两千户人家过来，最终约一千两百户住下，人口约八千人。新村成立前，相关地段本来有一个被称为“后尾芭”的自然聚落，人口大约八十人左右，多以务农为生，已设有神庙、学校。新村初期，政府以安全之名，严格管控居民活动与地方的发展，初到者通过马华公会与官方沟通协助，渐进形成一种独特的乡区聚落形式，更是型塑马来西亚多元民族却又分而治之的社会形态，影响至今。本文试图通过各方资料重构班达马兰新村在冷战大氛围下组建前后的景象。当中可以一窥早期“后尾芭”依附在巴生市与巴生港郊区的自然构成和后来新村的强制建成变化，加上当地居民早期戒严生活的记忆，借此组成马来西亚冷战图像的其中一片拼图。

关键词：后尾芭、班达马兰新村、冷战、巴生港口

Abstract

New Villages or Kampung Baru (in Malay) are the product of the Cold War. Pandamaran New Village located near Port Klang in Selangor is no exception. After it was established in 1951,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had forcibly relocated about 2,000 households from around Klang. In the end, about 1,200 households settled down and there were approximately 8,000 people. There was originally a natural settlement called Bukit Kerayong Road in the area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village. There were around 80 people, who were mostly farmer, and temples and schools were also founded.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new village, the government strictly controlled the residents' activities and local development

* 本文是马来亚大学研究项目GA011-2020的部分研究成果之一。2019年6月21日，本文初稿〈班达马兰新村在冷战初期建成景象〉曾在由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东亚系主办的“多元文明与跨区域对话：区域研究的新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并获得与会学者批评与指教，本文在此初稿基础上修订和增补而成。

** 林德顺 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高级讲师，马来亚大学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中心成员。电邮：lingteksoon@um.edu.my

in the name of security considerations. Through the MCA's official communication with and assistance of the government, the newcomers gradually formed a unique rural settlement. Such settlement has shaped Malaysia's multi-ethnic, yet divided and ruled the society, which has influence until today. With various material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reconstruct the situa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formation of Pandamaran New Village during the Cold War. In so doing, one can have a glimpse of the early Bukit Kerayong Road, located next to the city of Klang and the upper reaches of Port Klang, of its later transformation into a new village and the local residents' memories of the early life under martial law. This story forms a part of Malaysian history in the Cold War era.

Keywords: Bukit Kerayong, Pandamaran New Village, Cold War, Port Swettenham

一、前言

冷战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苏两强敌意对峙，乃至各自集结盟国，从多个主要领域如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进行对抗以遏制对方，但有共识不主动引发大型战争。学界普遍认同，冷战时代成功回避了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但其高度紧张的对峙中仍无可避免导致一些伤亡、专制统治、新殖民与文化霸权等现象。¹

马来亚人民在二战以后面对殖民统治和马共革命两大问题。英殖民政府在日本侵略军攻打马来半岛时节节败退至弃守而逃，战后却回归马来亚宣布持续执政，招致当地各族人民不满，争取独立呼声此起彼落，其中包括欲以建立马来亚苏维埃政权的马来亚共产党（以下简称马共）人士。两大问题最终引发互斗，加上冷战大环境下马来半岛的战略地位使然，英殖民地政府遂使用各种执政工具和手段径行压制，堪称是无硝烟战争。新村的出现即是这个争斗过程中的一个产物，百姓为刍狗。²

新村在马来西亚又称华人新村（New Village, Kampung Baru, Kampung Baharu），指涉约1950年代初期，英国殖民政府为了打击马来亚共产党而设立的新聚落。当时正值二战告终，冷战伊始，世界掀起一股去殖民浪潮，马共通过各种宪制手段争取马来亚独立不果，决定改走武力夺权路线，导致英国殖民政府在1948年7月15日通过宪报宣布实施紧急状态，以军事手段对马共进行打击。³战斗的过程中，英军有对抗游击战经验者建议把藏匿于森林中的马共的物资情资补给隔绝，因此在1950年中提出“布利斯计划”（Briggs Plan）。这个计划的策略之一是把居住在乡区，尤其是森林接壤处的居民

¹ 有关冷战史相关讨论，请参考Melvyn P. Leffler & Odd Arne Westad, 2010,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ichael Szonyi, 2008, *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江柏炜（编），2017, 《马祖：战争与和平岛屿：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连江：连江县政府。

² 有关马来亚/马来西亚紧急状态的记载和研究，请参考Philip Deery, 2007, “Malaya, 1948: Britain's Asian Cold War?”,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9, No.1, pp. 29-54, Karl Hack, The Origin of the Asian Cold War: Malaya 1948, *Journal of South East Asian Studies*, 40(3), pp. 471-496.

³ 事件肇始于1948年6月16日马共军士在霹雳州和丰（Sungai Siput）杀死三位欧籍园坵经理，英殖民政府随之宣佈该区晋入紧急状态，到了同年七月15日，政府更通过宪报宣佈把紧急状态扩散全马。Andaya, Barbara Watson & Leonard Y. Andaya, 2001, *A History of Malaysia*, London: Palgrave, 271.

强制迁移到一个选定的人造聚落，取名为新村（New Village）。新村地点的设定跟森林保持一段距离，整个新村边界以布满倒钩刺的铁丝网围起来，边角处设有哨碉监视，出入口堆叠沙包，军人或警察严密监控村民出入兼防备马共攻击，实施宵禁及严格规定外出工作者携带物品和食物种类及数量，违者酷罚。当时英殖民政府在马来亚各地总共圈定了四百多个新村，强制迁移人数约五十万人，约占当时马来亚总人口的百分之十。紧急状态实施了大约十二年，到马来亚独立以后，在1960年7月31日由当时马来亚国家元首端姑阿都拉曼（Tuanku Abdul Rahman ibni Al-Marhum Tuanku Muhammad）宣布解除紧急状态。（No.1957/0094519W，1990）⁴不过新村的聚落形态倒被保留下来，先前的戒严措施随着地区的马共威胁程度而渐次解除。

按照目前政府的数据，全马来西亚包括东马地区总共拥有四百五十二个新村。每个新村拥有本身独特的历史背景但也共同拥有一些传统记忆。其中冷战应该是新村的共同记忆。不过当中不同的新村肯定有它独特的记忆遗留，本文以号称为马来西亚第二大新村的班达马兰新村（以下简称班村）为个案，尝试梳理建构它在设立前的自然聚落与设立后的景象。从班村的早期发展中，可以看出居民群体在面对大环境影响下的政策无所对应，被动之下求生存和勉力争取所有可以争取的权益，导致他们可以在往后时段改变被边缘化的命运。

目前学界对新村的研究已经不在少数，例如由林廷辉与方天养合著的《马来西亚新村：迈向新旅程》（2005）、潘婉明的《一个新村、一种华人？重建马来（西）亚华人新村的集体记忆》（2005）、马大历史系高级讲师Ho Hui Ling的马共与紧急状态研究著作等，唯针对号称为马来西亚第二大新村班达马兰新村的专门研究尚未多见。以专书为例，目前应该只有2014年刘崇汉编撰的《走进巴生神庙—巴生港口班达马兰新村庙宇文化初探》集中探讨班村的神庙课题，其他的林廷辉和宋婉莹《马来西亚华人新村五十年》（2000）、雷子健《爱新村—雪州华人新村的美丽与哀愁》（2012）等只是在书中部分提及班村。本文是目前进行的班达马兰新村研究系列文章之一，希望通过研究班村的各个人文领域的课题，进而对它有全盘的认知。

二、班村前时代：后尾芭聚落

早在二十世纪初期，在雪兰莪英殖民政府的官方文件上已经有标名为“Pandamaran”的地区。（1957/0094519W，1990）它的地点处于巴生港口西南部，涵盖范围应该比现在的班达马兰新村还大。⁵那里早期是一片森林，1905年由英国种植公司“金希望橡胶园丘公司”（Golden Hope Rubber Estate）买下部分土地作为橡胶园。（Sivachandralingam，2018）1937年，英国皇家空军在距离巴生港口不到二英里西南部地区建成一座军用飞机场。（南洋商报，1935、1938）班达马兰新村则是二十世纪中期才出现

⁴ “Perisytiharan Tamat Darurat”，马来西亚国家档案馆网上资料，http://hids.arkib.gov.my/#/index_peristiwa?q=&day=31&month=7&year=1960，2021年3月15日浏览。

⁵ 针对此地名的诠释尚有争议，目前较为多数认同的说法是“Pandamaran”一词的词根源于“damar”即产于热带南洋杉科的一种，名为“贝壳杉”，学名“Agathis dammara”此树脂的用途很广，在马来半岛的传统用途是用作造船的粘合剂，同时也可以作为上色油。因此当地采集此树脂者被称为“Pendamar”。相信“Pandamaran”一词是从从而来。

的聚落。根据资料显示,在新村未出现之前,大约在1940年,它的附近已经出现一个被称为“后尾芭”的自然村。根据一位后尾芭居民洪仲坤先生的记载,他的父亲大约是1946年从瓜拉冷岳村(Kuala Langat)搬到那里居住,当时那里已经住着大约七、八十户人家,以种菜、养猪和各种家禽为生。⁶通过这些活动,他们的收成品不但可以自给自足,余者尚可以带到附近的巴生大巴刹(菜市场)贩售,作为家庭收入。根据资料显示,早期这里因为接近出海口,大部分土地是低洼的沼泽地,某些地方还低过水平线,因此每月逢农历初一与十五海水涨潮时,有时会导致部分地段淹水。⁷不过也因为下游地,土地肥沃容易进行农耕活动。洪父抵达时,当地已经有一家名为“广福宫”的神庙,庙里主祀铁府元帅。(刘崇汉 2014: 36-38)隔年,当地闻人施德水号召村人出资建立一所学校,成功在1948年完成建设及开课,学校取名为“中兴学校”。学校的地点在广福宫前大路往前不远处。洪仲坤在1949年入读一年级,当时学校只开一至四年级,有二十多位男女学生就读,校长为广东台山籍的陈琼石。⁸

从资料看来,后尾芭显然是处于繁荣的巴生和巴生港的外围郊区。初期到来的垦殖民相信是面对住处、职业与交际网络尚未完善的后来移民者。在二战期间和战后面对马共威胁而迁入者则是例外。在这里他们种植养蓄的农作物和牲畜有良好的土地和养蓄空间,同时也有邻近的销售市场。从聚居处角度看来这里没有高成本的聚居条件,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他们不止是城区日常物资的支援,同时也是市中心在城市化往外扩展的先期拓荒者。洪仲坤的记述也印证了这个程序。先有人过来垦荒,接着建立安定民心的寺庙,再后来才设立民智教化的学校。另外,后尾芭也是让居者远离各种公共权力紧密管制的地方。不过把这个地理形势放在1940年代末的时代背景下来解读,当时处于森林周边的后尾芭则是最容易接触到马共份子的地方之一。因此这导致此郊区的功能被改变,公权力开始关注这里的动静。

大约1947或1948年间,巴生县长开始联系后尾芭人士,欲委任一位村长作为政府与村民的联系人。后来村民林福才获得委任。(南洋商报, 1951a)相信政府的这项举动是为了防范后尾芭的马共势力坐大,需要委任一位代表负责管理地区事务。不过根据洪仲坤的记忆,林福才担任村长以后最主要的任务是帮助村民到警局担保被怀疑为马共份子的村民出来。他也负责帮忙村民申请身份证。不过据说如此他也被马共人士盯上,认为他与政府关系良好,未来可能对马共不利。1950年间,据报他被马共份子枪杀身亡。(南洋商报, 1951a)不止是他,还有几位居民因为不同的罪名,据说都被马共派人杀害。同年英政府宣布在当地进入戒严状态,陈琼石校长也被政府以马共嫌疑份子身份被捕,过后被驱逐回返中国,留下妻儿在后尾芭。⁹政府也开始派兵到后尾芭进行土地规划,然后在规划出来的区块边缘围上带有倒刺钩的铁丝网和设立两个有哨岗的出口。(The Star, 2015)后尾芭几乎都在铁丝网的范围内。之后村民被告知连他们都被指令搬离原有的屋子,到政府划分的地区住下。另外,政府更大的目标其实

⁶ 洪仲坤手撰稿《班达马兰新村史》。

⁷ 此问题后来在新村成立后由政府拨款建了一道二英里长的海堤,有效的在数年内防止海水淹村。”Penduduk2 ini Terancham Banjir Besar”, Berita Harian, 21-09-1959.

⁸ 南洋商报1954年5月19日的一篇报道“巴生谢麦联姻”有提到这位陈琼石校长。《南洋商报》,“巴生谢麦联姻”,1954年5月19日。

⁹ 洪仲坤手撰稿《班达马兰新村史》。

是打算把巴生市及巴生港口周遭的郊外居民迁移进来，因此他们委任了六位移民官，其中四位为华裔，通过他们规划一片可以供上述地点搬迁过来的居民各有一栖之地。他们也在围篱的范围内搭起三排的亚答长屋作为临时住所。¹⁰根据当时政府的统计发现后尾芭的居民已经有三十二户，人口约两百余人。（南洋商报，1952g）

三、设立新村

自“布利斯计划”宣布以后，因应成立的州移殖委员会开始规划在雪兰莪州境内寻找一片土地以设立新村。根据一份志期1951年5月19日由雪兰莪州作战委员会执行官威尔沙（R. G. H. Willshaw）致给当时英属马来亚布政司卡瑞（Carrel）的信函中告知，州政府建议在瑞天咸港（巴生港）旁的军用机场附近一片面积240英亩的地段建立一个新村。这个地段被规划收容散居在巴生县沿海地区的730个家庭。（1957/0300316，1951）威尔沙也说明他们将在新村中建造一座大型宿舍供其中390个家庭居住，另外他们准备三百片各占半英亩的农地供另外三百个农人家庭居住及进行耕种，另外还预计建设四十家商店供余下做生意的家庭。这个计划预计将耗费叻币五十万元，当中包括政府提供各类的迁居补贴、铺设与建造各种基本设施如水供、道路、街灯、排水排污系统等加上保安措施如围篱、哨岗、照明灯等。¹¹

这封公函提到的新村构想应该是最初的构想，即英殖民政府把附近郊区的居民逼迁过来，在安顿他们的生活需求后，接下来就是解决他们的就业需求。因此他们规划出土地让部分村民务农，至于其他人，扣除经商者，其实在村外的巴生、巴生港、园丘农田还有大量的职缺。班村的地点距离巴生港是一英里，巴生市则3.5英里，都是相当靠近。¹²此公函发出不久，在同年7月1日，其中一位移民官美自斯氏（St. Bellis）在出席马华公会巴生支会的工作委员会议时也亲自公布说不久政府即将在后尾芭地区建立一个新村，称届时将迁移一千七百卅余家（可能为记者笔误，应该是“人”），将获得政府拨出数百英亩土地供他们进行农耕，各种基本设施水、电、道路、沟渠、警局、医疗室、学校、商店、住屋、猪寮等一应俱全，而且每户迁入者政府还会提供搬迁津贴。（南洋商报，1951d）“。。。俾将该处居民集中，加以保护”（南洋商报，1951b）

这里有一点关于地名的说明。班达马兰新村最初设立时，其正式名称为“Selangor-Pandamaran-Port Swettenham Resettlement Scheme”，后来在1952年5月1日的公函里开始称为“Pandamaran Resettlement Village”。最迟在同年5月8日的公文里，英政府才开始用“Pandamaran New Village”至今。（1957/0300316，1952a）中文方面，因为没有

¹⁰ 通过前村长叶文平先生的安排，本研究有机会访问到其中一位华裔移民官李维昌先生。另外通过旧报章查询，发现另外一位移民官名美里氏（美利氏、毕利氏）、副移民官刘瑞连，《南洋商报》，“巴生区移殖官调升新职村民将开会欢送”，1951年11月2日、《南洋商报》，“巴生港口新村国民学校建委会议”，1952年1月14日。

¹¹ 从当时的海峡时报的广告看到，村民们七月迁入，到了八月英国殖民地政府才在报章刊登广告招标兴建厕所工程，“P.W.D Tender Notice”，*The Straits Times*, 1951-8-17.

¹² 关于巴生港和巴生市与班村的距离数据是取自以下两份资料：Sel. Sec. 1188/52. 31, Request for Payment of Annual State Grant-in-aid to the Klang Town Council for Upkeep of Pandamaran Village, “Polis Serkup Perhimpunan Kongsi Gelap”, *Berita Harian*, 1958-4-23.

正式统一的名称，最早在1951年，一些华文媒体把它称为“巴生港口移民新村”。从资料上看到，最迟到1952年1月14日，相关名称已被改为“巴生港口新村”。（南洋商报，1951e、1952j）另外，亦有少量新闻报道在1951年称它为“巴丹马兰新村”、“班打马冷移殖区”、1952年“班达马南”。（南洋商报，1951a、1951i、1952e）至于目前通用的“班达马兰新村”则最迟于1954年才有中文媒体开始少量冠用，不过可以发现到了1961年，它开始取代“巴生港口新村”成为常用名，并沿用至今，而后者则仍有少量运用，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新明日报，1986）

综合各方资料，英殖民政府大约于1951年6月下达移殖令。后尾芭居民在此之前已经被令迁离原有的住处，搬到现在班村大街和四区一带。政府当时的计划是想把他们原有的居住地空出来给未来入住者作为农业地。首批从班村外迁入者在7月初开始入住。最早的是从武吉贞安、万津和摩立郊区的华人。¹³据悉他们是在早上五点被英军和移民官叫醒，通知他们即刻收拾衣物搭上政府准备的罗里就往班村去。到了那里，他们被安顿在之前已经建好的移民所，然后居民被允许再搭乘罗里回返原住屋拆除木板带回来在自己的地段上建屋。一些在班村或附近有亲戚者也被鼓励暂住在亲戚家，以便腾出移民所的位子给其他居民。这一批人获得分配的地段是属于“A”区（现在称为第一区）。第二批移民则是从瓜拉冷岳、直落坡和甘榜爪哇一带人士。他们被分配到“B”区（现在称为第一区）地段。¹⁴第三批则来自龙溪、巴生中路郊区和加埔镇二、三里人士。他们获得分配到“C”区（现在称为第一区）地段以成立家园。至于第四批人士则是从更遥远的瓜拉雪兰莪的峇东（又称峇冬）新村迁移过来，他们被分配在后来叫第四区的“D”区。¹⁵

报章报道政府当时调动了全州乃至到柔佛州和其他地方调借五十辆罗里（货车）帮助人民进行迁移，据说速度非常快。不过根据记录，到7月末时，只有七十户人家迁入班村。报道甚至认为到了七月底整个过程即可完成。（南洋商报，1951j）从八月份报道看来，其实陆续还有新移民搬进来。报章报道这件事是因为当时入住移民所的新移民，在8月5日不巧遇上暴雨强风，把其中一家移民所的屋顶掀起，伤及住民。（南洋商报，1951c）

根据我们跟前副移民官李维昌先生的访谈，他认为雪兰莪州移民局对班村居民的迁移是做了非常好的安排。除了在第一天当天通知即刻需要收拾软细搬走比较仓促以外，到了班村，现场已经备好移民所宿舍可以入住。政府也有划分一块土地供他们居住，各种基本设施已经齐备。工作方面，因为班村坐落于距离巴生市和巴生港附近，居民们非常容易找到工作。他说英政府当局当初甚至连居民的方言习惯都考虑到，只让操福建语的华人入住，避免未来在新村里发生族群冲突。¹⁶后来看到另外一个专访中他还说明某些到村外橡胶园丘从事割胶者还赶上五十年代韩战爆发，橡胶价格

¹³ 洪仲坤手撰稿《班达马兰新村史》。

¹⁴ 同上。

¹⁵ 同上。

¹⁶ 2016年4月8日，通过本研究课题的合作者刘崇汉先生与班村马华公会领袖及班村第一代住民叶文平先生的安排，我们有机会与刘维昌先生进行一个大约一个小时的访谈。刘先生作为当年的其中一位副移民官，亲身经历甚至本身是主导者，因为新村的土地划分及何人得哪个地段皆由他来决定。另外一位受访村民叶建成的回忆裡也是认同当时分地时是由刘先生主导。

飞涨导致他们收入大增，是他们以前在郊区种菜时不敢想象可以得到的收入。（*The Star*, 2015）

不过报章也报道班村移民的另外一种情况，即是在1951年11月17日，马华公会的巴生支会派五位代表到新村探访，他们回报时认为当地居民状况凄惨。移民们投诉迁入时发现移民所的住屋只有数间，人数过多无法住下，导致有部分人被迫夜间露宿空地，附近有亲戚者则到亲戚处借宿，物品则露天置放，遇上雨天则损失惨重。（南洋商报，1951h）因此华文报章以“难侨”来形容他们。巴生支会在12月1日的常委会议上议决要发动大规模筹款行动来帮助他们改善生活。（南洋商报，1951g、1951h）同样陷入困境的也包括后尾芭居民。到了1952年5月3日，他们再度被政府下令迁入村内的正式规划住宅区。（南洋商报，1952g）看来当时后尾芭居民并没有遵照初期的搬迁令进行搬迁，后来又拖到7月22日，政府又再一次下令搬迁，后尾芭居民唯有通过马华支会争取收回搬迁令。（南洋商报，1952m）后来通过县长与议员跟居民对话，献议提供一百元建筑费，唯必须在数星期内清空原居地。（南洋商报，1952f）结果政府又改变主意让部分居民留下来而部分继续被强制搬迁。（南洋商报，1952l）

南洋商报1952年3月20日的报道称，在3月17日早上五点多，殖民局又开始逼迁行动。他们到瓜拉雪兰莪的峇东新村，命令五十余家约两百余人的家庭即刻搬迁，在没有提供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全村人民包括八十余名孩童都必须步行前往班达马兰新村。政府在全体人民走出屋外后即把全村房屋起火烧毁。在这样仓促逼迁过程中，许多人的财物也跟着销毁或者失窃。全体居民最后到了当天晚上九点才抵达班达马兰新村，全程没有获得饮食，让许多孩童饱受痛苦。报道称过后该移民官刘瑞连接络马华公会，请他们过来协助，马华公会救济委员会主席即刻购买食品前往新村供居民食用，然后将召开会议讨论进一步的救助。（南洋商报，1952b）过后到了五月，由马华雪兰莪州分会领袖宣布，除了政府给予居民的逼迁赔偿一百元以外，公会也提供峇东新村一百五十户人家各一百元的援助。不过当时村民要求公会帮忙向政府申请比照同村二十七户马来家庭的免费建屋方案，暂时还没有下文。另外，报道也提到在吉隆坡甲洞的增江新村，政府给予的逼迁补助还包括在事先在新村建好耗资三百元的屋子骨架和屋顶免费提供给居民，可见各地的新村逼迁情况不同。（南洋商报，1952a）后来政府在各方不断争取之下，同意把逼迁援助提高到每户五百元，而马华之前答应的每户一百元则因为后来逼迁户突然增加导致减少至每户七十元。（南洋商报，1952q）

从上述提到的各地居民来处，加上参考更多的文件和旧报章补充对比下，可以发现班村居民的来源大致于来自以下地方：

- i) 巴生市和巴生港贫民窟（*The Straits Times*, 1952c）
- ii) 加埔镇（Kapar）（1957/0300316b）
- iii) 瓜拉雪兰莪峇东（峇冬）新村（Ulu Tiram Burok）（*The Straits Times*, 1954、南洋商报，1955）
- iv) 万津镇（Banting）（南洋商报，1952n）
- v) 武吉贞安（现称武吉樟钢 Bukit Changgang）移殖村（*The Straits Times*, 1952b）

- vi) 瓜拉冷岳 (Kuala Langat) (1188,/1952.8A, 1952)
- vii) 龙溪 (Dengkil) (1188,/1952.8A, 1952)
- viii) 直落五支、八支
- ix) 巴生榴莲沙莪、爪亚
- x) 后尾芭原有住民

四、公共设施和非政府组织

(一) 公共设施

1952年3月21日，威尔沙再给卡瑞写第二封公函。信函里透露了第一期计划已经执行，730户人家已经在那里住下，唯当初他们申请的五十万叻币拨款只批了四十八万叻币。在这封公函里，其实威尔沙的目的是要求马来亚联邦殖民政府同意让他们进行新村计划第二期。这次他们计划迁移另外1770个家庭进入新村。这么一来，他们需要征用额外的387.5英亩的土地及高达九十二万叻币的拨款。(1957/0300316, 1952c)

不过海峡时报早在1952年1月30日的报道里，提到威尔沙的第二期计划。记者写道，雪兰莪州殖民政府雄心勃勃要把班达马兰新村打造成一个可以容纳一万六千名居民的现代化聚落。通过政府一百五十万叻币的拨款，未来在这个占地约六百五十英亩（应该是包含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总面积）的平地上，预计将在该年的7月完成基础设施建设。当时村内有大量的农地和村外工业区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在已经有约一千户人家住下的基础上，未来还会吸引约二千五百户人家迁移进来。报道也称誉该新村的地点有从安全角度考量，因为它的四周距离藏匿马共的森林区至少有一英里之遥。另外政府也正在规划让新村供电和供水，未来甚至打算建两家电影院在村内。在公共卫生和经济发展平衡方面，政府为了保证村镇的公共卫生水平，也计划把养猪业迁移出村外，到时政府另外将再拨出郊外的土地供村民进行农业行为。记者预言，若果这些计划得以成功落实，到时这里将会是马来亚联邦里最大的新村。(The Straits Times, 1952c)

当时大部分村民已经入住，但从报道看来原来生活设施却尚未齐备。报道访问一位匿名的官员表示，村里的电力供应才开始要安装，自来水则安装了几支水管供全村人民取用。(The Straits Times, 1952c) 其时新村计划已经实施超过六个月，但这些设施尚未提供或者有所落差，显然政府的执行力有所不足。交通方面，自1952年开始，政府通过一家巴士公司为班村人民提供往返巴生和班村的巴士服务。据报道到了当年二月末时，公司因一小时一班的班车不足于应付民众需求，决定增加班次至一个小时两班。(南洋商报, 1952d)

另外，最早时期原来英殖民政府还安排一批印度籍居民入住班村。不过居民投诉至印度驻马来亚代表处，因此当1952年4月26日印度驻马来亚代表拉玛克里斯那 (TVRamakrishna) 实地探访班村后，他直接去函马来亚布政司抗议那里的环境非常恶劣，声称当时还有90位印度籍村民还住在没有隔间，没有地板的临时帐篷里，整个环境非常不卫生及肮脏。(1957/0300316, 1952d) 这封投诉函最终导致几乎一半的印

度人被迁往附近的橡胶园丘生活及工作，因为他们在这里无法自费建房子，同时也找不到工作，而橡胶园丘公司则愿意提供免费住宿和工作机会。

随后因为雪兰莪州华人劳工调查专员麦其（JCS Mackie）提出新村就业情况报告显示村内有百分之二十的失业率，让雪兰莪作战委员会决定把第二期增加村民的计划从总户数两千三百（之前威尔莎的计划是两千五百，这里已减两百）大幅减少至总户数一千两百户。（1957/0300316a, 1957/0300316, 1952b）经过一番的增减，经过大约一年后，巴生港口新村的村民大致稳定下来，约有六千人之多。

班村原有的学校在1949年被政府下令关闭，最大的原因应该是学校校长和老师被政府怀疑为马共份子，学校有可能成为传播共产主义的场所，因此被下令关闭。过后由移民官本身发动居民重新设立一所新的学校。1951年10月12日，移殖官美利士在巴生港口侨众大会上倡议成立一个募捐委员会进行募捐建校行动结果获得通过。该募捐委员会在11月20日宣布隔日开始向各界热心人士筹募建校基金。据该委员会副主席曾炳梅透露，全校建筑费约马币七万余，英殖民政府只答应津贴三万八千五百元，因此另外还不敷之数，唯有对外募捐。（南洋商报，1951f）该劝捐活动在1952年的7月23日宣布结束，不过通过报章的报道没有说明是否筹到足够的款项，只报道说是次召开结束会议而已。（南洋商报，1952p）新校舍于1952年末建成，是一座拥有16间教室，可容纳680学生。有趣的是，学校在11月30日举行开幕典礼后不久，州政府又宣布要筹款建造第二所校舍了。这次由政府提供四万元建筑费，马华公会补助两万四千元，尚有一万五千余元的缺口需要筹款。（南洋商报，1952o）

在安全方面，政府在九月向居民宣布，要居民在十五日之前成立新村自卫团，凡十八岁至五十岁者（相信这只限男性）必须参加，由他们参与新村安全守卫工作。据报章报道，截至十四日为止，已经有三百余名居民报名，政府决定选出其中四位居民派往吉隆坡受训，以便他们回来以后当自卫团的教练。（南洋商报，1952i）

截至1952年12月初，班村的人口已经比年头增多约两百五十户，总共约八千多人。

到了1953年5月，巴生市议会召开会议商讨如何把新村纳入市议会的管辖范围内。他们发现，虽然目前新村不在市议会的管辖范围内，但村内各种公共设施的维护和提供都由市议会出钱，因此建议把它纳入范围以便征税。（Sel. Sec. 1188/1952.10, 1953）过后，市议会和县办公室都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包括咨询州医药与卫生局是否有足够的人手调派到新村，另外他们也根据新村的人口和户数计算可以征税的单位和预计的收入等。1953年11月24日，雪兰莪州政府正式宣布把巴生港口新村纳入巴生市议会的范围里。（Sel.G.N188/52）随后市议会正式为新村建一座菜市场、铺设自来水管及道路、管理排水排污系统等。不过到了1955年，市议会发现对新村征收的税务依然入不敷出，他们唯有去函州政府，要求依照市议会在班村征收到的税收以一元对两元的比率给予补贴。州政府最终同意。

除了上述公共设施，到了1952年，班村还有民众会堂及商店。医院则是1952年10月19日获得红十字会的赞助在村内建立一家红十字医院。（南洋商报，1952k）不过大街的街灯需要等到1956年才能安装。邮政局也是到了1961年7月以后才有。这些服务除了是官方拨款以外，民间或者半民间团体也有尽一份力量。

(二) 半官方组织

成立于1949年2月27日的马来亚华人公会（后来在马来亚改名为马来西亚以后也改为马来西亚华人公会，以下简称马华公会）的其中一个宗旨就是帮助大多数为华人的垦耕者被逼迁后展开新生活。¹⁷新村设立以后，马华公会的工作重点也扩大至面对全部新村人士。

例如村民刚搬到新村之时，政府声称答应提供两百元叻币的建屋补贴，马华公会则另外提供一百元的额外补贴。过后他们也在福利救济、赠送建材和农具、筹建华文小学（派代表加入董事部）等方面或多或少的参与及付出，因此那时候的确形成“马华公会是华人的代表”的形象。在班村，1952年5月17日举行大会议决成立“马华公会巴生支会巴生港口新村小组委员会筹备会”，6月就成功获得约一千名村民的加入成立了巴生港口新村小组委员会。（南洋商报，1952c；*The Straits Times*, 1952a）他们后来的活动也包括在巴生港口新村倡组成人教育班，教授国语、算数、英语和常识等科目。（南洋商报，1952h）

另外一个半官方组织是巴生港口新村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在1952年6月，由当时的巴生县长亲自到班村召集全体村民举行村民大会选出的。在那场大会巴生县长也乘机向村民解释政府对新村的施政方针，然后才主持选举。该委员会在同年8月正式成立，负责帮助村民与各政府单位沟通协调。当然，委员会里的成员大部分拥有马华公会党员的身份。还有一个巴生港口新村自卫团在1953年4月28日成立时，团员已经有千人，选出的“会长”（应该是团长）曹仁初，也是马华公会党员。（南洋商报，1953）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华人的神庙和基督教堂是华人信徒自力或者是获得外界同道同修出钱出力所建，政府在这方面也是没有施予援手。（南洋商报，1952r）

五、戒严记忆

本研究除了收集各种文本资料以外，也曾进行口述历史访问及实地考察工作。其中口述历史访谈方面有收集了大约二十位人士，主要是曾居住在班村乃至后尾芭或者跟班村有联系人士。访谈内容一般聚焦在他们的生活记忆，无论是搬迁前或者搬迁后，或者后尾芭时代或者班村时代。还有几位人士则是讨论班村早期行业例如锯板业和制炭业。从这些访谈内容有涉及戒严记忆的大约有以下几位。首先是有后尾芭生活经验的洪仲坤和卢金峰。洪仲坤的经历都写在他的自撰稿当中。他提到后尾芭时代，马共已经渗透到村内。因此居民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有人在马共定下的各种罪名下被杀害。与此同时，政府又怀疑村民是马共支持者，因此又有未经审讯即展开逮捕的行为，不少村民因此被警方无辜逮捕。帮助村民担保的林福才就是因为这些问题而奔波。不过最让洪氏感到震撼的就是某天在上学途中亲眼看到林福才倒卧街头，原来是前一晚被马共份子杀害。从那之后政府便派警方加紧巡逻后尾芭乃至把它列入戒严区。不久后中兴学校被关闭了，他也被迫停学，直到班达马兰新村国民学校成立以后，他报读二年级，继续小学生涯。

¹⁷ 在英殖民政府的正式称呼为“squatters”，他们是早期被英政府逼迁入新村的对象，不过后来许多不是垦耕者人士也被迁入新村，因此无法把全部新村居民定义为垦耕者。

卢金峰则是通过2019年4月中的一个访谈中提到早期他住在后尾芭的生活记忆。他是1942年在后尾芭出生。与洪仲坤不同的是，他没在中兴学校就读。他在改名为港口新村学校（后来又改为巴生班达马兰华文小学A校）念一年级。不过后来他遭遇生活意外导致手臂残折，便辍学在家。几年后他在家人鼓励下向校方申请重新入学，最终完成他的小学生涯。他谈到后尾芭改换为班村后，因为戒严，人民出入非常不方便，村内经济处于普遍贫困的状态。因此他自小就开始半工半读为补贴家里。对于马共，他的看法和其他年长的受访者大致上是一样，还是不大愿意公开讨论他们的功过。

叶建成是在少年时代跟随家人从武吉贞安搬迁过来，不过他们应该不是第一批从武吉贞安过来。因此他虽然被分配到“A”区，不过门牌号码已经排到900号以后了。他回忆说自从搬到班村以后，因为戒严的关系，他只好在村内做一些低收入的工作如种菜和养猪。那时全村戒严，因为他有参加自卫队的关系，也被分派到守夜看哨的任务。据他回忆当时他们还被分配到一把长枪。警方有教导简易的枪械使用知识，不过他的理解是警方并没有要他们开枪，而且在他短暂的守夜经历中也没开过枪。这样的生活很快就过去了，大约1953年通过朋友介绍，他在吉隆坡找到一份工作，便离开班村，因此班村的戒严记忆就停留在当初班村刚设立的时候及自卫团的那段经历。在跟我们进行访谈的2018年，他还是相当避讳马共话题，认为这是非常敏感的话题，不应该公开讨论的。¹⁸

颜宇川在2020年5月14日受访时说，他的父亲早期从中国过来，辗转到雪州瓜拉冷岳落脚务农。1951年，他们全家在新村计划下被令迁移到班村第一区。当时他们在瓜拉冷岳生活受到马共的威胁非常严重。政府过来命令村民搬去班村，那里他们每户将获得分配一片土地，违抗者在瓜拉冷岳的屋子将被放火烧毁。颜父听从指示拆屋准备搬迁，家人起初是被政府安排暂时集中住到学校去。他们家的屋子拆好了政府派军车一家一家收集了帮忙运去班村。父亲起初每天凌晨五点半骑自行车一个小时到班村去建自家的小木屋。当屋子成形后，他就住在那里继续建，不回去瓜拉冷岳。他们家人住在学校大约三个星期，等屋子建好了政府又派军车来把家人都载过去。因此颜先生一家不曾住在移民所。不过那时候新村戒严，他父亲严词警告孩子不能在生活中提到“共产党”三个字，他们都引以为戒。到了班村，颜宇川先生已经15岁了。本来他在瓜拉冷岳求学，到了班村他被迫去工作，曾经当过割胶工人、散工、黄梨厂到后来码头工人，生活才稳定下来。谈到班村的戒严生活，他并没有太深刻的记忆，倒是当时家里贫穷，工作辛苦让他不愿意再回忆告知。

六、结语

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终于获得独立建国。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与他的领导班子雄心勃勃欲带领国家进行国族建设，建构一个有本身特色的新兴国家。不过当时在冷战的氛围下国家因为国防的考量和英国控制本国在马来亚的利益，导致马来亚在外交上选择投靠西方阵营，因此国家在独立自主发展过程中进步缓慢。1972年1月，在雪兰莪州政府完成一切必要的立法程序以后，雪州苏丹正式宣布把瑞天咸港改名为巴生港

¹⁸ 叶建成访谈是在2018年2月6日下午于其新村住家进行。

（Pelabuhan Kelang）。这是政府努力摆脱殖民地印记的动作之一。目前为止，主流意见仍是认为，英国殖民地经历对马来亚及马来西亚的现代化建设是正面多于负面。不过马来西亚政府在追求国家主体性的努力上，选择把殖民时代的负面作用放大。冷战时期他们与马共的对峙导致紧急状态下专制，设立新村让一成人口饱受逼迁、人命伤害和军管恐惧，经济资产归零重新来过，是殖民政府带来的负面影响，另外在政府文官制度、法律体系、金融体系和教育制度等的建立及培训、全国大城市基本设施的建设等则为后来的独立平稳过渡则有正面的意义。本文尝试以班达马兰新村和前期后尾芭的居民生活作比较，从中检视冷战对人民造成的干扰与损耗。与此同时，安全与自由的取舍至今依然是一个大问题。领导者的专制如何取得，不限于共产国家，号称民主自由的国家与政府也可以因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等理由而获得专制的便利。因此虽然上个世纪冷战的结束标注著一个时代过去，这个时代若还有新冷战的发生，以往的历史记忆与教训应该可以扮演参考甚至是警惕的角色。

参考文献

- Andaya, Barbara Watson & Leonard Y. Andaya, *A History of Malaysia*, London: Palgrave, 2001.
- 1957/0094519W, 1900, “Mr. Darby’s Request to Cut A Catch Water Drain along the Road Reserve from Kuala Klang to Pandamaran”, 21/09/1900.
- 1957/0300316a, The Employment of Labourers Report from J.C.S. Mackie, the Assistance Commissioner for Labour (Chinese) Selangor.
- 1957/0300316b, Re: Bukit Kapar, 8th, 9th, 12th, and 13th Miles Kapar, Letter from Sgd Lee Choon Ngam, President of M.C.A. Kapar Branch to The President of M.C.A.
- 1957/0300316, 1951, Resettlement Scheme Selangor-Pandamaran-Port Swettenham, letter from Mr R. G. H. Wilshaw, State Secretary of Selangor to Mr Carrel, The Chief Secretary of British Malaya dated 19 May 1951.
- 1957/0300316, 1952a, Indians ex Ulu Tiram Burok, letter from Klang District Officer to The Selangor State Secretary dated 8 May 1952.
- 1957/0300316, 1952b, Resettlement Schemes Selangor Pandamaran Agricultural Scheme (Telok Gadong), letter from Mr J.L.M. Gorrie, State Executive Officer of Selangor War Executive Committee to Secretary for Defence dated 3rd July, 1952.
- 1957/0300316, 1952c, Resettlement Scheme Selangor-Pandamaran-Port Swettenham Phase II, letter from Mr R. G. H. Wilshaw, State Secretary of Selangor to Mr Carrel, The Chief Secretary of British Malaya dated 21 March 1952.
- 1957/0300316, 1952d, The Plight of the Indian Inmates at Pandamaran Resettlement Village, From Sgn T.V.Ramakrisna to The Chief Secretary to the Govt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dated May 1st 1952.
- 江柏炜（编），2017，《马祖：战争与和平岛屿：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连江：连江县政府。
- John Doraisamy & G. Durairaj 2013. *Port Klang’s Journey Through Time*, Port Klang: Port Klang Authority.
- Karl Hack. The Origin of the Asian Cold War: Malaya 1948, *Journal of South East Asian Studies*, 40(3), pp. 471-496.
- 雷子健（编），2012，《爱新村—雪州华人新村的美丽与哀愁》，莎阿南：雪州政府新村发展委员会。
- 林廷辉、宋婉莹，2000，《马来西亚华人新村五十年》，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刘崇汉（编），2014，《走进巴生神庙—巴生港口班达马兰新村庙宇文化初探》，加影：新纪元学院。

Melvyn P. Leffler & Odd Arne Westad 2010.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ichael Szonyi 2008. *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南洋商报，1935，〈雪兰莪州属议政局在巴生皇宫举行杨旭龄对飞机场地点用途及费用均有所质问但政府均有详细答复通过马来金榜地问题及金矿收买金沙条例修正案〉，《南洋商报》，11月21日，10版。

南洋商报，1938，〈马来亚去年间新机场多落成民用空航方面有长足进步官方报告书作详细叙述〉，《南洋商报》，10月29日，16版。

南洋商报，1951a，〈巴生港口巴丹马兰新村两幼童坠井丧生〉，《南洋商报》，12月28日，7版。

南洋商报，1951b，〈巴生港口机场附近将建立新村〉，《南洋商报》，7月2日，8版。

南洋商报，1951c，〈巴生港口新村移民答屋为暴风吹倒横祸飞来七人在睡梦中受伤〉，《南洋商报》，8月6日，7版。

南洋商报，1951d，〈巴生马华支会工作委员会〉，《南洋商报》，7月1日，10版。

南洋商报，1951e，〈巴生区移殖官调升新职村民将开会欢送〉，《南洋商报》，11月2日，7版。

南洋商报，1951f，〈港口新村国民学校筹建校舍今日出发劝捐〉，《南洋商报》，11月21日，7版。

南洋商报，1951g，〈马华巴生支会决大规模筹款救济巴生港口新村难侨成立小组会选各部职员日内出发募捐希各同侨解囊襄助〉，《南洋商报》，12月5日，8版。

南洋商报，1951h，〈马华巴生支会派代表往港口新村慰问难侨〉，《南洋商报》，11月20日，7版。

南洋商报，1951i，〈武吉曾江移民区居民遭当局迁至班打马冷理由为极少向政府提供情报〉，《南洋商报》，11月14日，10版。

南洋商报，1951j，〈雪州村民移殖工作本月底将全部完成调用他州罗里协助运输巴生港口移殖区开始迁入村民〉，《南洋商报》，7月2日，7版。

南洋商报，1952a，〈峇东新村被令迁居民要求政府建屋颇有望雪马华分会已援助每户百元〉，《南洋商报》，5月4日，10版。

南洋商报，1952b，〈峇东新村五十余家住民被迁巴生港口新村小孩啼饥号寒情形凄惨马华支会已行急赈〉，《南洋商报》，3月20日，7版。

南洋商报，1952c，〈巴生港口巴丹马兰新村订卅一日商成立马华小组委员会〉，《南洋商报》，5月23日，7版。

南洋商报，1952d，〈巴生港口巴丹马兰新村将增加一辆巴士川行每小时开行两班〉，《南洋商报》，2月29日，7版。

南洋商报，1952e，〈巴生港口班达马南新村后尾芭四百余依葛空地将分配予居民耕种〉，《南洋商报》，6月2日，8版。

南洋商报，1952f，〈巴生港口后尾芭百余户居民被迫迁移县长暨李荣德莅该村办事处解释限六星期搬清每户贴建筑费百元〉，《南洋商报》，8月8日，9版。

南洋商报，1952g，〈巴生港口后尾芭卅二住民当局再令迁徙请马华会援助〉，《南洋商报》，5月8日，7版。

南洋商报，1952h，〈巴生港口新村成教班招生〉，《南洋商报》，10月3日，8版。

南洋商报，1952i，〈巴生港口新村村民三百名参加自卫团〉，《南洋商报》，9月16日，8版。

南洋商报，1952j，〈巴生港口新村国民学校建委会议〉，《南洋商报》，1月14日，8版。

南洋商报，1952k，〈巴生港口新村红十字医院定十九日开幕〉，《南洋商报》，10月7日，8版。

- 南洋商报, 1952l, 〈巴生港口新村后尾芭被拆迁之七住户马华支会拨赠每家五十元救济金〉, 《南洋商报》, 10月31日, 7版。
- 南洋商报, 1952m, 〈巴生港口新村后尾芭居民当局又再令迁徙马华支会请求政府收回成命〉, 《南洋商报》, 7月23日, 7版。
- 南洋商报, 1952n, 〈巴生港口新村马华小组委会为居民福利事谒要求七项蒙分别答覆〉, 《南洋商报》, 9月5日, 7版。
- 南洋商报, 1952o, 〈巴生港口新村学校筹建第二校舍经费尚不敷万余元移民官函各界踊跃输将〉, 《南洋商报》, 12月3日, 8版。
- 南洋商报, 1952p, 〈巴生港口新村学校建委会举行结束会议〉, 7月25日, 7版。
- 南洋商报, 1952q, 〈被迫迁至巴生港口新村居民马华公会发救济金每户口获得七十元政府津贴金已增至五百元〉, 《南洋商报》, 6月11日, 7版。
- 南洋商报, 1952r, 〈马各地青年团契会代表莅巴生港口新村将建布道堂〉, 《南洋商报》, 8月14日, 7版。
- 南洋商报, 1953, 〈港口新村自卫团成立管理委员会〉, 《南洋商报》, 4月29日, 10版。
- 南洋商报, 1955, 〈瓜拉雪兰莪市政局决购地重建新村使峇东村民迁回重整故业函地主于廿三日到局会商〉, 《南洋商报》, 2月18日, 10版。
- 南洋商报, 1961, 〈为提高各乡区邮政服务政府决派流动邮车往瓜雪及巴生乡区每周服务时间地点公布〉, 《南洋商报》, 7月10日, 14版。
- “Perisytiharan Tamat Darurat”, 马来西亚国家档案馆网上资料, http://hids.arkib.gov.my/#/index_peristiwa?q=&day=31&month=7&year=1960, 2021年3月15日浏览。
- Philip Deery 2007, “Malaya, 1948: Britain’s Asian Cold War?”,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9, No.1, pp. 29-54.
- Sel.G.N 188/52, Declaration of Port Swettenham Town Board Area Extension.
- Sel. Sec. 1188/1952. 8A, Harvesting of Crops on Coffee Land in Sungei Lempit Area, Tanjong Dua Blas, Kuala Langat, Letter from Mr W. B. Tucker, the Kuala Langat District Officer to Mr Yap Chui Leong dated 5th November, 1952.
- Sel. Sec. 1188/1952. 10, Pandamaran New Village, Letter from the Chairman of Klang Town Board to the Selangor State Secretary dated 17th June, 1953.
- Sel. Sec. 1188/52. 31, Request for Payment of Annual State Grant-in-aid to the Klang Town Council for Upkeep of Pandamaran Village, “Polis Serkup Perhimpunan Kongsy Gelap”, *Berita Harian*, 1958-4-23.
- Sivachandralingam Sundara Raja 2018, *The Economy of Colonial Malaya: Administrators Versus Capitalists*. London: Routledge.
- The Star*, 2015, Edward Rajendra, “Where Rags to Riches Stories Abound”, *The Star*, 3rd February
- The Straits Times*, 1951, “P.W.D Tender Notice”, *The Straits Times*, 17th August.
- The Straits Times*, 1952a, “MCA Branch for Village”, *The Straits Times*, 25th June.
- The Straits Times*, 1952b, “No Longer A Town Board”, *The Straits Times*, 13th March.
- The Straits Times*, 1952c, “Patrick Keith, “Squatters Build a Model Town”, *The Straits Times*, 30th January.
- The Straits Times*, 1954, “Back to a New ‘Old Home’ for these 100”, *The Straits Times*, 30th December.
- 新明日报, 1986, 〈不可忽视的一颗马华新星黄俊杰出任马华总秘书〉, 《新明日报》, 9月4日, 9版。